



精 英 的 兴 衰

[意]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著

刘北成 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英的兴衰/(意)帕累托(Pareto, V.)著;刘北成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袖珍经典)

ISBN 7-208-04451-1

I. 精... II. ①帕...②刘... III. 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IV. B0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3052 号

责任编辑 王 歌

封面装帧 朱舒君



世纪文景

·袖珍经典 012·

精英的兴衰

[意]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著

刘北成 译

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 张 3.25

插 页 2

字 数 40,000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ISBN 7-208-04451-1/C·146

定 价 8.80 元

出版说明

从西方思想史的角度看，由帕雷托（Vilfredo Pareto）、莫斯卡（Gaetano Mosca）和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所奠定的精英理论，是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重要传统之一。其中，细致阐发精英循环运动论的帕雷托，可谓此一传统的肇发者。而《精英的兴衰》这本短小洗练的册子，乃是知识界公认的最重要的精英理论读本。不过，尽管精英理论针对社会诸领域都提出过率真、犀利乃至激进的见解，但是，其基本的思想进路依然不可避免地局限于精英至上的范围中。因此，在本书的汉语译本与读者见面的同时，我们敬请广大读者审慎阅读，从西方政治思想的整体轮廓与脉络出发，解读和诠释本书。

目 录

一、若干社会学定律.....	1
二、宗教危机上升时期	21
三、旧精英的衰落	42
四、新精英的兴起	58
五、主观现象.....	78
译名对照表.....	91

一、 若干社会学定律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用事实对某些社会学理论进行客观的检验。

人们在论述社会学或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时，在脑子里通常有某种要加以捍卫的现实秩序。在此，我不想指责这种习惯，只是想告诉读者，我不仿效这种做法。这样声明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上述做法的结果，人们对作者的言词的解释常常比作者的本意要宽泛得多。譬如，假如某个作者指出某种秩序的某种缺陷，人们就认为该作者抨击这整个秩序，甚至还会猜想，该作者偏爱与这种秩序相对立的另一种秩序。

举例来说，假如某人发现普选制有缺陷，那么人们就认为，他肯定偏爱有限的选举制度；假如某人指出民主政体的弊端，那么人们就认为他赞成

贵族统治；假如某人赞扬君主制度的某些方面，那么他肯定反对共和制度；反之亦然。简言之，任何一句特指的话都被赋予普遍的意蕴。这样做并不全错，而且常常是一针见血，击中要害。作者越是想说少些，读者的推断就越多。这种方法在文学中令人赞赏，但在科学中就不太适用了。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本文中每一论断只含有本身的特定意义，绝不应给以广义的解释。

我还要简要地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宁愿选取眼前的事实而不局限于历史事实。后者当然有其优点：考察它们时会冷静些，不那么感情用事，偏见也要少些。但是，它们也有相当不利之处，因为我们对它们知之有限。而且，上面说的优点常常是虚构的，因为我们习惯于将我们现在的感情带进历史，譬如，一位狂热迷恋德意志帝国的历史学家不会容忍对凯撒或奥古斯都的任何尖刻批评。今天的民主主义者也不会赞成阿里斯托芬。

现在，我们转入正题。首先我们提出一些从事实中得出的社会学定律。对于这些定律我们还将用事实加以检证。我们的这种做法是克劳德·贝

尔纳*所推荐的方法：从事实到概念，再从概念返回到事实。不过，现在发表的这篇片断只是我目前正在撰写的社会学论著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的篇幅要大得多。我希望我能完成和发表这部论著。因此，我们姑且承认这些定律是多少有些道理的假说，然后我们来看看它们是否有助于解释事实。

首先，我们要指出，人类的大部分行为并不起源于人们的逻辑推理，而是起源于情感。对于非经济动因的行为，大体上可以这样说。但是对于经济行为，尤其是与工商业有关的活动来说，情况可能相反。虽然人们的行为并不是出于合乎逻辑的动因。但是，人们愿意将自己的行为在逻辑上与某些原则联系在一起。为了说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他们在事后发明某些原则。因此，常常可以看到，A行为在实际上是B原因的结果，但是行为者却说它是未必存在的C原因的结果。用这种方式欺骗人的人首先欺骗自己，并且

* 克劳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 1813—1878), 法国生理学家, 实验医学的奠基人之一。——译者注

对自己的说法深信不疑。

由此可知，任何社会学现象都有两种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形式：一个是确定实际事物之间的关系的客观形式，另一个是确定各种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的的主观形式。我们可以想想哈哈镜：镜中的物像都是变形的，现实中笔直的东西变成弯曲的，小的变成大的，等等。与此相似，人的意识在反映客观现象时，是通过历史学或当代人的证言而形成知识。因此，如果我们想了解客观现象，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满足于主观现象，而应该从主观现象正确地推断出客观现象。实际上，这就是历史批评的任务，即不仅仅对历史资料进行考证，而且还要进一步考察人们的心理。

雅典人因担心波斯人的入侵，而派人到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殿问卜。神谕说宙斯赋予雅典娜一道坚不可摧的木墙。因此，雅典人便登上木船，在撒拉米（Salamis）大获全胜。这是当时很多人看到的现象，也是希罗多德记载下来的现象。但是，客观现象显然是另外一回事。今天，可以说没有人再相信阿波罗、雅典娜或宙斯。因此有必要寻找撒拉米大捷的

更真实的原因。实际上，是铁米斯托克里*说服了雅典人动用国库建造舰船，因而取得胜利。但是，希罗多德在报道这一情况时并没有暗示这个真正原因的作用。由于巧合，舰船已经造好，因此遵从神谕便轻而易举了。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雅典人虽然意见纷纭，但是所关注的只是阿波罗答复的真正涵义是什么。这关系到人们应该怎样行动。有些人相信，木墙是指雅典的石墙，另一些人则认为神祇指的是舰队。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铁米斯托克里本人也只是对神谕进行解释。这样，真实现象与主观现象之间的反差就更明显了。

仅仅研究这两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是不够的。还有第三个问题，那真实现象是如何作用于主观现象？修正后者或者相反？达尔文主义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个极其简单的答复，但遗憾的是，这个答复只适用于过去。根据达尔文主义，这两种现象的关系是通过逐渐淘汰不能适应这种关系的个人而建立起来的。

* 铁米斯托克里 (Themistocles, 约公元前 524—前 460)，古希腊雅典执政官。——译者注

在我们上面举的例子中没有淘汰任何人。因此我们不知道，雅典人为什么实际上倾向于神谕的某种解释而不赞成另一种解释。我们也不知道铁米斯托克里是否真的相信自己的解释。今天人们对类似的事情会持将信将疑的态度。因此，如果我们今天的人来判断当时的人，那么我们会相信真正的原因是雅典的海上力量，这种力量对铁米斯托克里有潜意识的影响，由于有了这种刺激，他首先说服自己，然后劝说别人相信神谕指的是舰队。

在某些人看来，我们举的例子过于明显，不足以说明问题。但是，如果我们选取某个实质上与这个古代例子相同的现代例子，他们可能马上会改变想法。与铁米斯托克里解释神谕一样，法国很多人诉诸“1789 年的不朽原则”，或“保卫共和国”的口号，其他国家则有很多人诉诸“保卫荣耀的君主制”的口号。因此，他们都隐藏了自己行为的真实原因而提出想像的原因。俗话说得好，“老鸹笑话猪黑”。那些嘲笑古人迷信的人常常代之以现代迷信。现代迷信并不比他所摒弃的古代迷信更有道

理或更真实。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思想。然而，我们将上面所说的观点与这些思想结合起来。

当代人尤其是杰文斯 (Jevons)、克莱门特 (Clement)、朱格拉 (Juglar) * 以及其他先生的著作细致研究的经济危机，严格地说，不过是斯宾塞 (Spencer) 视为一般运动规律的节奏规律在特殊场合的表现。我在《政治经济学教程》一书中曾提出如下观点：这些危机不仅源出于纯粹的经济原因，而且也是人的本性造成的；进一步说，它们只是心理韵律的多种表现之一。换句话说，存在一种情感韵律。我们可以在伦理、宗教和政治中观察到它。它的波动与商业的周期循环很相似。我最近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个观点。历史学家们注意到这些波动。但是，除了偏离自然过程太远的理论，如周期理论外，一般不把这些波动视为有规律的总运动的一部分现象。但是，我们到处可以发现与上

* 朱格拉 (Juglar, 1819—1905)，法国医生兼经济学家。——译者注

面最明显的事例相似的情况。

罗马史的研究者曾注意到，导致有教养阶级从罗马共和国末期和公元 1 世纪的无信仰转变为帝国末期的有信仰的大浪潮。

这一宗教浪潮是基督教的源泉。它横扫了整个古代世界。它的胜利与它对当时各种原理和学说的深刻改造和大量吸收不无关系。异教学者都大肆鼓吹基督教的箴言和思想，以致人们为了解释塞涅卡 (Seneca) 的情绪而推测塞涅卡与圣保罗 (St. Paul) 之间的各种联系。勒南*发现，基督教只是当时宗教情绪的多种表现形式中的一种。

我们习惯于将当时的历史描绘成基督教与其他有本质差别的宗教或学说之间的斗争。而且，我们认为，如果不是基督教，而是密特拉**崇拜或其他东方崇拜取得胜利，或者异教信仰再度兴盛的话，近代历史的进程会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但是，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诚然，A 教派、B 教派、C 教派等等之间曾经激烈角逐过。但是，所有

* 勒南 (Renan, 1823—1892)，法国哲学家。——译者注

* * 密特拉 (Mithra)，波斯神话中的太阳神。——译者注

这些都出自一个原因：即日益增长的宗教情绪。这个才是主要的事实，而 A 事实、B 事实、C 事实等等都是次要的。当然不能说它们微不足道，因为形式对于修改本质所决定的现象也有某些作用。但是，如果把第二位的事物说成是第一位的，则是错误的。

多尔比尼 (D'Orbigny) 在论述玻利维亚的情况时写道：

在峡谷入口和两侧斜坡上几乎都有木十字架……我想它们是祭神用的 (apachectas)。后来，当我发现它们遍布玻利维亚共和国的印第安人居住区时，我的看法得到证实。这些石堆是身负重物、艰难地攀登陡坡的当地人堆积的。他们用这种石堆向万物的主宰、无形的帕查卡马克神*表达感激之情，因为帕查卡马克神给了他们抵达顶点的勇气，同时，他们祈求获得新的前进动力。他们停顿下来休息

* 帕查卡马克 (Pachacamac)，秘鲁沿海土著居民在被印加人征服以前所信奉的造物之神。——译者注

片刻，拔下一些眉毛抛向空中，或者将他们口中嚼着的可可——他们最贵重的东西，放在石堆上，如果是穷人的话，他就在附近拿一块石头，把它添加到其他石头上。今天一切依旧，惟一的变化是当地人不再拜谢帕查卡马克神，而是拜谢基督徒的神祇，十字架成了神的象征。

毛利(Maury)写道：

在西西里，圣母玛利亚占据了所有的色列斯*和维纳斯(Venus)神殿的位置，而原来的宗教仪式也部分地用来祭奉她。

显然，各种不同的形式所表现的同一种情感，而这些形式与情感本身相比则是次要的。毛利补充说：

这一源泉继续以一个圣人的名义接受原

* 色列斯(Ceres)，古罗马谷物女神。——译者注

来以一个神的名义接受的供奉。

在这个例子中，什么是主要事实呢？是促使人们取悦于这一源泉的情感，还是以向某个圣人或神祇祈祷的形式表现这种情感的现象？答案是明白无疑的。人们相信某个神灵的干预能够治好眼疾是主要的，而为此目的乞灵于埃斯库拉庇俄斯*或圣徒卢西亚(Santa Lucia)则是次要的。召唤基督教的魔鬼而不召唤异教的海克提**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人们相信这种咒语的法力。有人认为某种信仰起源于另一种信仰。这种说法绝不确切，更接近于真实的见解是，二者有共同的起源——人们觉得自己能够迫使神秘的力量服务于自己。

因此，很显然地，A教派对B、C教派的胜利往往是形式的胜利而不是本质的胜利。在琉善***的观念与先知亚历山大****的崇拜者的观念之间，当然存在本质的差别。如果琉善的观念取得胜利，

* 埃斯库拉庇俄斯(Aesculapius)，古罗马医神。——译者注

** 海克提(Hecate)，古希腊冥界女神。——译者注

*** 琉善(Lucian，约120—约180)，希腊讽刺作家。——译者注

**** 亚历山大(Alexander)，琉善同时代的宗教家——译者注

那么欧洲历史就会与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截然不同。但是,在这个先知的崇拜者的观念与另一个先知的崇拜者的观念之间几乎只是形式的差别。无论哪种观念取得胜利,历史几乎毫无改变,尤其是胜利者甚至在形式上也不得不向失败者做出让步。

在此,我们不探讨这些情感大潮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起来的;也不像唯物主义的历史解释那样,探讨它们是否仅仅起源于经济条件;也不探讨是否同时产生了其他不能追溯的因素。要想同时解决所有的问题,实际上是违反科学的。人们应该逐一地进行研究。因此,我们姑且假定存在这些潮流,以后再试着作进一步的研究。

人们被这些潮流所裹挟时通常是不知不觉的,他们想把不自愿的、非理性的行为表现成自愿的、理性的行为。他们异想天开地发明种种理由,不仅对别人而且对自己隐瞒真正的行为动机。不同派别之间的形式之争常常越拉越远,漫无边际。例如,某个人想研究拜占庭时期各种基督教派之间的争执,但结果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囚禁疯

人的牢笼。一般来说，即便这类形式问题能引导出本质问题，也使人想到孟德斯鸠关于神学所说的话：“由于它所研究的内容，同时也由于研究的方式，它加倍地令人难懂。”我们在阅读某些法国民族主义者的论述时，不由会怀疑这些人是否精神健全，但是在那些似乎是而且的确是愚不可及的言词后面隐藏一个非常重大的本质问题。“民族主义”不过是抗拒今日法国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

即便是在很有理智的争论中，所提出的理由也很少涉及到本质。在法国 1789 年革命前夕，人们一味地谈论“人道”、“情感”、“博爱”，但实际上正酝酿着雅各宾派的屠杀和劫掠。今天这种漂亮的把戏正在开始全面地重演。资产阶级一方面煞有介事地鼓吹“团结”，另一方面却在实际上制造灾难。这些灾难最终将摧毁所谓的“团结”。

在历史上，除了偶尔的间断外，各民族始终是被精英统治着。我是按照词源的意思使用精英 (elite) 这个词的。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无论好人还是坏人。然而，根据一条重要的生理学定律，精英不可能持久不

变。因此，人类的历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断更替的历史：某些人上升了，另一些人则衰落了。真相便是如此，虽然它常常可能表现为另一种形式。

新的精英力图取代旧的精英，或仅仅想分享后者的权力和荣耀。但是，他们并不公开坦诚地承认这种意图。相反，他们充当一切被压迫者的领袖，宣称他们所追求的不是自己的私利，而是许多人的利益：他们所为之战斗的不是一个有限阶级的权利，而是绝大多数公民的权利。当然，一旦赢得胜利，他们就镇压昔日的盟友，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对后者做一些表面的让步，罗马的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历史便是如此。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胜利，人们熟知的近代社会主义者的胜利也都是如此。

潘塔列奥尼 (Pantaleoni) 教授在最近一篇论文中认为，社会主义不会取得胜利。而我曾断言，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非常可能的，而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两种观点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两种不同的事情。潘塔列奥尼考虑的是主观现象，而我注意的是客观现

象。我们两人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设想，当第一批基督教团体在巴勒斯坦出现时，有人争辩说：

这些人决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只有疯子才会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财富、文化和社会地位的差别会被废除。只有傻瓜才会认为一切人会真的变成兄弟，他们会抛弃一切感官快乐，他们在妇女的肉体上只会看到永恒生命的光辉。一千年后还会有富人和穷人、国王和臣民、强者和弱者，还会有不少酒色和狂暴之徒，兄弟之间还会互相残杀。

说这话的人可能是对的。诚然，第一批基督徒所想像的基督统治还没有降临。但是，断言基督教会胜利的人也没错。事实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在这里，同样的措辞涉及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我们还可以用距我们较近的时代做一个更恰当的比喻，因为我们对这个时代了解得更清楚些。让我们假设，在法国 1789 年革命之初有人说：

这些想改革国家的好人在做梦。谁会相信社会契约，你们会说，公意是不会有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多么严重的错误，无论多么愚蠢的迷信，在任何一个时间和空间里都没有得到全体人民的支持，而且常常没有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的原因。你们还会说，人天生是善的，只是僧侣和国王把他们变成坏人。无疑，这些无稽之谈是儿童都不会相信的。如果这个漂亮的原理是你们新政府的支柱，那么一万年以后你们才会看到它付诸实践。你们会说，理性的统治即将开始。你们作为心理学家可太糟糕了。在未来的千万年中，人类的大多数行为依然会是由情感决定的。你们还会说，在理性的统治下，人民之中的善良的、精明强悍的、诚实的、品德高尚的、“富于情感的”人会温文尔雅地、毫无震荡地改变现存状况。谁若是相信这种话，那他也会相信，凶残的野兽能够变成温柔可爱的鸽子。你们的全部著述都基于错误

的前提，你们那些美貌的女士在大谈“自然人”的美德时都神智不清，她们是些不知自己在说什么的傻女人。可以断言，下个世纪的人与我们现在的人极其相像。你们这些哲学家所设计的新时代不会降临。

另一个人会反驳说：

很好，你说的都对。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稳定的大众统治。我们的哲学家所吟唱的安谧和美德的牧歌既是现实的，也是虚构的。但是，在这些词句背后，你会看到一种新兴的寡头政治集团正准备打垮和取代现在的掌权者。新的寡头政治集团肯定会胜利，因为它生气勃勃，强大有力。如果旧的精英虽然强大却宽容和明智，那么这种胜利是不流血的。如果，按照“要和平就得准备战争”（*si vis pacem, para bellum*）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意味着一方面准备去无畏地战斗，另一方面则懂得如何适时地接纳从平民中崛起的、准备组

成新的精英的那些人，加入自己的行列。然而，那种追求根本改变的意愿，使旧的精英付出了无数血泪代价。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旧的精英愚蠢地大谈人道主义，从而自己解除了武装，变得衰弱了；另一方面，它排斥新的精英，从而迫使后者奋起战斗。

事实证明，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彼此毫无矛盾。

托克维尔指出：“法国革命是一次政治革命，它也具有一次宗教革命的后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宗教革命的外观。”人们可以忽略这句话的可商榷之点，而断言法国革命是一次宗教革命，它是由上层阶级制造的，但却反过来反对他们，它将权力转交给一个新的精英——资产阶级。

人们常说，这场革命是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产儿。这种说法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即人道主义的无神论削弱了上层阶级。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对下层阶级的影响几乎等于零。革命主要是下层阶级的宗教情感(广

义上的宗教情感)对上层阶级的无神论的反抗。同样的情况在宗教改革时期也部分地存在。当时僧侣集团也陷入怀疑论，神父们更关心的是尘世利益，而不是天国的利益。宗教改革发轫于北方的粗俗平民之中绝不是偶然的。那里的基督教情绪比较活跃。而宗教改革在文化发达、怀疑论盛行的意大利几乎没有成效。当时的宗教反抗采取了一种基督教的形式。而在 1789 年，法国的宗教反抗则采取了社会的、爱国主义的、革命的以及反基督教的形式。这两个例子涉及的是同样的情感，但却具有不同的形式。

从法国革命中冒出的新精英的统治，即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自革命爆发不到一百年，至少在法国它已经出现严重衰落的迹象。当然，在另一方面，在美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它还保持着相当大的活力。

客观地考察这种现象，有三个层次的重大情况值得注意：1. 宗教情绪日益浓厚，这表明我们处于危机上升时期；2. 旧精英的衰落；3. 新精英的兴起。

从主观上说，第一层事实在我们意识中的反映并没有很大的歪曲，但是另外两层事实在我们头脑中的形式却与现实颇为不同。旧精英的衰落表现为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情感的增长，而新精英的兴起则表现为卑微之众对强大权威的报复。

二、 宗教危机上升时期

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最近一些年来，各文明国家的宗教情绪已经有所发展，而且还在继续增长。这不仅仅有利于现存的各种宗教——它们可能是各种不同的基督教派，而且尤其给一种新的宗教情感增添了活力。这种新的宗教情感，表现为社会主义。许多杰出人士，无论社会主义者还是他们的敌人，都明确地承认，社会主义是目前的一种宗教。历史学家应该认识到，这种宗教现象理所当然地属于迄今最重大的现象之列，只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兴起、新教改革和法国革命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此外，爱国主义已高涨到新的高点，它也采取宗教的形式。在德国，一家权威杂志竟然谈论“德意志的上帝”。在英国它以帝国主义的形式出现、

在法国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在美国以极端爱国主义(jingoism)的形式出现等等。

这些重大现象表现为旧的宗教之间的竞争，和一种新的强大宗教的兴起。除此之外，其他比较次要的现象向我们揭示了宗教情感是如何侵入人类活动的一切现象的。而且这些现象似乎不可遏制地要采用宗教形式。

例如，一些高尚人士声称，酒类的消费有害于人类种族。但是，这些人的活动并不仅仅是建议采用适当的卫生保健手段，局限于这种温和适度的界限里，而是越出这些界限，达到宗教狂热。这个运动产生了苦行僧、布道者和准备做出各种牺牲的殉道者——只要能使某个人少饮一杯酒。如果他们真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便说他们“拯救了一个人”，如同基督教布道者说他“拯救了一个灵魂”一样。他们也有一些派别，如“禁酒会”，以及宗教派别，如多明我会(the Dominicans)、方济各会(the Franciscans)或相似的会。他们有人会仪式、各种礼仪以及神秘的联系。他们听到神秘的演讲时，也如痴如狂。此外，当时，不少卫生学家在捍卫自己的

理论时非常激动，以致在稍理智的人看来，他们似乎中了魔。他们确实准备为保护一个人的健康而杀死他。因此，比起用火刑来拯救人的灵魂的宗教裁判所，他们显得更失常。

另外，有些人在不遗余力地捕猎“淫秽读物”。他们也超越了正当检查的适当界限。当然，他们之中有德高望重、无可挑剔的人士，但是，奇怪的是，在他们之中竟然有只盯着这一点，而毫不考虑其他事务的人。他们用最淫秽的语言大谈崇高的道德理想。在某个城镇，他们让年幼的中学生在一份要求关闭妓院的请愿书上签字，而这份请愿书的语言是十分下流的。有时，当你与他们之中的某个调子唱得较高的人谈话时，你会发现，越是谈论两性的结合问题，越是抒发对享受爱情欢乐的人的无比愤慨，他就越会容光焕发、神采飞扬。简言之，他的表情完全显示了一个男人急欲得到女人的热望。

我认为，除了一般的宗教情感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即人们早已指出的，情欲有时也伪装成宗教情感。人们已经提出很多有关的例子，是患

歇斯底里症的妇女例子。我们会看到下面这种情况，某些人如果生活在其他时代，譬如生活在 13 世纪末，他们很容易屈服于支配他们的情欲。在今天，由于环境不同了，他们会感到内疚，会尽量控制自己，但是他们同时用言词来满足自己难以压抑的欲望。总而言之，这些人很乐于有机会能有道德地做某种不道德的事情。他们通过获得某种想像中的享乐使自己的良心保持安宁。我的一位朋友认识一位富有而美貌的太太，她在青春流溢的年龄并不守贞操，当她上了年纪，虽然风韵犹存，但却真诚地沉浸在宗教信仰中。她以令人赞叹的热忱和巨大的牺牲精神，献身于一个改造妓女的机构。我的朋友相信这位太太的动机是真诚的。对于她献身这种圣徒事业的惊人热忱，他解释说，在这种活动中，她回忆起过去，并希望继续得到享乐，这种享乐不仅没有内疚，而且甚至有行善的感觉。至于某些得意洋洋的道德家所表现出来的对不太禁欲的人的强烈愤慨，其根源不仅在于那种宗教情感和门户之见——异端必须被置之死地，而且在于那种无缘享乐者的潜在和盲目的妒忌，

阉人对正常男性的妒忌。

素食主义者也是一种相当可笑的宗派。他们用计算证明，土地能够生产比肉类多得多的谷物和大米。因此，他们希望废弃肉类以获得更丰富的食品。有一种神秘的社会宗派现在享有很高的声望，他们用一些心理实验来证实自己的论点。他们声称，我们都吃得太多了，我们应该节食。这些可敬的绅士们说，这样就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更多的人会有食物，尤其是，我们会有无穷尽的子孙。在这些可怜的幻想家看来，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而不生育，是莫大的罪过。马尔萨斯是他们咀咒的魔鬼。他们会烧死所有的希腊和拉丁诗人，因为这些人不守节操。他们的理想是，所有的人都是苦行者，不吃肉，不沾酒，除非为了生儿育女否则不谈情说爱。他们惟一的享乐大概是吟唱团结赞美诗。

苦行者与社会主义者的关系，和孟他努派*与正统基督教会的关系相似。正统基督教会确实费

* 孟他努派(Montanists)，从公元2世纪到9世纪基督教会中的异端，强调严格修身、恪守教规。——译者注

了很大力气来摆脱那些愚蠢地夸大它的教义的人；在一个地方跌倒，却在另一个地方爬起，这种做法甚至导致在中世出现用鞭笞自己来赎罪的人和詹森派*空想家。

人们在国外旅游时，不仅会见到数量较多的理智健全的人，而且会见到少数狂热分子。长期生活在意大利，从未出国的人不会对现代苦行者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他们会认为某些报道太夸张了。实际上这些报道都是轻描淡写，远未反映出真实情况。从罗马时代到今天，意大利始终是一个宗教情感非常淡薄的国家，或许，有朝一日，意大利会产生第二次文艺复兴，就像被新教改革很快制止了的那次文艺复兴。

唯灵论 (spiritualism)、神秘论 (occultism) 以及其他类似的迷信有不少信徒，而且随着一般宗教情感的增长，信徒的数目也在增加。例如，有些人非常认真地对待某个患歇斯底里症的穷女人用火星语言书写的呓语；他们举行了一些有关这个有

* 詹森派 (Jansenist), 17、18 世纪出现的天主教非正统派别。

——译者注

趣主题的会议，会上云集了热衷神秘论的妇人和姑娘。报喜天使加布里埃尔 (Gabriel) 通过一个巴黎少女的嘴与人交谈；形形色色的庸医借助神秘的程序来治病；如果说没有琉善那样的人来讽刺这些伟绩的话，倒是不缺少想充当先知亚历山大的角色的候选人。

如果不是在危机时期的话，这种狂热绝不会超出一小圈人，而且只能有微小的影响。但是在危机加剧时期，这些人的活动就扩大了，而且促使产生普遍的运动。

神秘论、“象征论” (symbolism) 以及其他空泛之物正在大举侵入文学、艺术和科学。你依然可以选择自己愿意为之唱赞美诗的宗教形式，但是，赞美诗是必须唱的；否则公众不会买这本书，因此出版商也不想印它。

新的神秘论者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合乎理性的，但实际上他们严重地侵犯了逻辑学，而且他们所说的往往只是重复古代神秘论者的言词。例如，为了证明某个关于某人移居火星的故事，他们郑重地对我们说：“科学不能解释一切。”此话不错。

但是，张三不能解释一种现象，并不能因此推论说，他必须接受李四的解释。如果张三不知道雷电是什么，并不因此就必须赞同李四的观点，认为是朱庇特发出了雷电。另一些人虽然更精明些，但也是重复一个相当陈旧的论点。他们实际上在说：“这样的事物应该是真实的，因为说它是真的对人有利。”于是，人们发现了一个多少世纪已经为人所知的真理，即支配人是情感而不是理性。由此可以推论，宗教情感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有相当大的作用。但是，由此并不能准确地推测出，这种作用应该有多大才能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而且我们决不能推论说，A 形式，而非 B、C 等形式，对人有利。有一种推理实际上是说：“人在很大程度上受情感支配，因此他必须完全屈从于某种宗教，而这种宗教必须是 A。”这是违背逻辑推理的一个例子。禁酒鼓吹者将酒注射进一只小动物的皮下，这只动物痉挛而死。他们由此得出一个逻辑推论：人不应该饮酒！他们也在人身上进行实验。他们观察到，一个人在饮了含酒精的饮料后，在短时间内感觉传递到大脑的过程减慢了。他们由此推断：酒精

对神经系统有毒，人应该禁酒。如果这种推理是合乎逻辑的，那么下面一段话也合乎逻辑了：

人一吃完饭，消化过程就开始了，此时大脑变得迟钝，任何智力活动都减慢了。因此，食物对神经系统有毒，因此人应该禁食，应该饿死。

正如有人说过的，如果消费酒类饮料会在几年之内消灭人类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么所有饮水的人需要做的只是等待；经过自然选择，这个世界很快就只剩他们了。而自从挪亚时代到今天这种情况居然尚未发生，这真不可思议。

据说，为了“团结”，A 必须给 B 钱，因为 A 应该以 B 的福利为自己的快乐。但是按照同样的道理，还是为了“团结”，B 应该拒绝剥夺 A，因为否则会严重地伤害 A，使 A 不快活。正如人们指出的，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B 部分蒙受的危害也是对整体的危害，在 A 部分也有反应。有人由此推论说，A 应该以某种方式帮助 B。这种推论是不合逻辑的。首先，A 也可以消灭 B，正如一个人患有坏

疽,他可以截去一个肢体。其次,如果给 B 以帮助,而结果是退化的,不能适应环境的个人急剧地繁衍起来,那么帮助 B 不仅有害于 A,而且有害于整个社会。

如果试图证明这类论点是错误的,那是徒劳的,因为诉诸这类论点的人首先不是为了说服自己。他们发明这些论点主要是为了论证他们事后已经加以肯定的那些行为。因此,即便论证过程可能非常清晰有力,很能影响人们的思维,使人们放弃自己的论点,其结果也可能是靠不住的,人们可能一无所获,因此他们可能是用同样错误的论点或者更错误的论点,来取代自己以前的论点。除了极其个别的情况外,他们从其他地方得来的信念可能丝毫没有改变。

甚至实证科学也不能免于宗教情感的侵袭。著名的天文学家费耶(H. Faye)在讨论太阳系的起源时,认为有必要补充说:

我们在考虑这些原始时代时,不能不注意《圣经》中的《创世记》第一章。它表明,人类

最初既没有愚蠢的拜物教，也没有煞有介事、实则荒唐的多神教，也没有属于下九流的占星术狂热。

天晓得，这位作者是否真的相信《创世记》第一章描述的是原始人？他居然会从未听说过有关古代人的历史研究或有关史前人的研究！他在自己著作的结尾说，生命将走向终结，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相信，我们的智慧成果不会有这种结局，它将会使我们更接近我们的神圣原则。对于它们的生存来说既不需要光和热，也不需要一个新的地球；它们已经被搜集到一起，因此它们不会灭亡。

这位作者想说什么？如果一切生命都消灭了，“智慧成果”如何能保存下来？这些都不得而知。与这种胡言乱语相比，轮回之说就成了具有科学精确性的典范了。值得庆幸的是，作者在谈论地球了无生机时幸存下来的“智慧成果”时，没有提到“团

结”。也许在另外一篇天文学论文中会突然提到它，我们且拭目以待。拉普拉斯(Laplace)的论述与费耶的论述是不一样的。不过，时代在变化，圣人也在变化。

甚至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学说也至少是间接地遇到了麻烦。精明能干的数学家曼申(Mansion)在一篇提交给天主教徒国际科学大会的报告(1891年4月4日)中竭力证明，无论如何，托勒密体系与近代体系具有同样的或几乎同样的价值。

选择地心说的又一个更深刻的理由是：古人明确地将天文学这门有关天体现象的科学与对星体运动原因的探究区分开……因此，选择何种天文学假说对于他们都无所谓，他们觉得采用地心说毫无不便之处。地心说比其他观点更符合表象，能更直接地被人使用。

这种说法倒使我们多少也敢于相信，如果古人愿意的话，他们本来是能够服膺牛顿的理论，而不选

择托勒密的理论、因为前者“比其他观点更符合表象，能更直接地被人使用”。

布伦涅梯耶尔（Brunetiere）对天文学知之甚少。他声明：“让我们站在你们的伽利略一边吧！”然而，那位精明能干的科学家在论述这件事时却步入歧途。他精细地分析道：

在 16 和 17 世纪，在伽利略审判案前后，学者们非常懂得天文现象的哲学解释与天体运动研究的区别。当时，正是由于这种区分，人们完全理解，对伽利略的指责是以哲学的名义进行的，这绝不妨碍天文学研究。

不幸的伽利略，如果他能再生的话，我们的新天主教徒会马上把他送回监狱！曼申先生在谈到审判和监禁伽利略“绝不妨碍天文学研究”时真令人啼笑皆非。

我们还是把这些枝节抛开，回到主要问题上来。正在增长的宗教情感，看来很可能对社会主义这种新的宗教比其他旧的宗教更有裨益。至少

在重大的宗教危机时代，一般都会发生这种情况。这种优势是否以后会导致摧毁旧的信仰，一如基督教摧毁异教那样？旧的信仰是否被允许存在，一如在佛教和新教改革时期那样？这些尚不清楚。在我看来，如果社会主义将不得不作某些修改，而且从与之竞争的宗教中吸取大量的东西的话，第二种假设更有可能实现。

目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与基督教的兴起颇为相似，这一点已有一些人指出了。然而，它与新教改革的相似也是千真万确的，虽然这一点还不太为人所知。还应该指出，我们不能停留在这几件事实的比较上，我们会发现在一切重大的宗教危机发生时都有类似情况。我们很快会发现这种相似已经超出了纯粹宗教现象。

很显然，甚至在某些特征上都可能发现十分相似之处。众所周知，最早的基督徒相信，基督在人世间的统治很快就会降临。几年前，社会主义者也认为，他们的学说的胜利近在眼前，但这种希望被事实否定了。目前，这类希望又重新燃起，但已把时间推到比较遥远的将来，正如相信千禧年说

(millenarianism) 的人所怀抱的希望。拉坦齐奥 (Lattanzio) 说：

将来人世会受到蹂躏，人们没有力量反抗暴君，暴君依靠着大群的盗贼奴役着世界。在这种危难之时，上帝必然会伸出援救之手。

社会主义者过去和现在一直在说：

将来财富会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经济危机会越来越频繁和剧烈，集体主义必然会来援救这个世界。

拉坦齐奥说：

那时大地将证明它是肥沃的，它会自然生长出丰硕的果实。蜂蜜会从山间、岩石中喷出，美酒到处流淌，河流溢满牛奶。世界最终将变成乐园，一切天性都变得可爱，不再受到

邪恶和过失的支配。

在集体主义统治下的世界也许诺有类似的幸福。很多人对此加以描述，但只要提一下德·阿米契斯(De Amicis)就够了。

一些基督徒已经心灰意懒，不再期待在较近的将来看到基督在人间的统治。其中最睿智者发现，若要战胜他们的对手，就必须更讲究实际、更宽容些，因此，一方面他们维持着原始教义作为理想的目标，另一方面他们实践着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最低纲领中也采取类似的行动方式。伯恩斯坦(Bernstein)公开赞同这种新方针。在荷兰，强硬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正在销声匿迹，让位给国家社会主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已经和正在沿着这一方向走下去。因而与非社会主义者日趋一致。在法国，社会主义者变成一个执政党，米勒兰*成为瓦尔德克—卢梭(Waldeck-Rousseau)内阁的一员。在英国，费边社

* 米勒兰(Millerand, 1859—1943)，法国社会主义者，自1899年加入资产阶级内阁，任部长。——译者注

(Fabians)的多数人都投票赞成帝国主义。在德国，有很多社会主义者乐于与帝国调情，教区神父瑙曼*在他的著作《民主与帝制》(*Demokratie und Kaisertum*)中公开宣传，皇帝应该成为社会主义者的首领。实际上，这位集体主义基督徒宣传的是军国主义、战争和消灭德国的敌人，而且消灭那些虽然不是敌人但拒绝做它的奴隶的人。从耶稣在加利利(Galilee)宣传爱与和平到好战的教士在僧袍外面罩上甲冑，以耶稣的名义去出征杀戮，这中间经历了很多世纪。但是，从德国人向无产阶级宣布喜讯，到某些德国社会主义者用“无产阶级互相残杀”的格言取代“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格言，却只有几年。

下面，我们将从这些事实中得出进一步的推论。这里，我们只想指出，正如经济危机时期的情况那样，将会造成宗教危机下降时期的力量，已经在目前的上升时期露出各种迹象。瑙曼和他的朋友们并没有宗教信念，他们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

* 瑙曼(Naumann, 1860 - 1919)，德国著名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译者注

社会主义者。他们是精明狡猾的人、渴望从伙伴的信仰中谋取利益。这就像教皇用基督徒的银币来建筑圣彼得大教堂；或者，甚至在异教徒的盛宴上挥霍这些钱。如果这些政治上实用的社会主义者将能胜利的话，那么，某些依然保持旧的社会主义信念的人会重复这样一句话：“噢，君士坦丁，你造成了多少邪恶。”因为这句话出自但丁，因此他还可以接着引用说：

请告诉我，我们的主
在把钥匙交给圣彼得之前，
要从他那里索取多少财富？
他所要求的仅仅是：跟我来。

换言之，对于献身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李卜克内西(Liebkecht)或倍倍尔(Bebel)，“社会主义”要从他们那里索取多少财富(它所要求的仅仅是：跟我来)？

另一个在下降时期显示出来的迹象是虚伪。现在，在像意大利这样的迫害社会主义的国度里，

社会主义者的信念毫无虚伪之处。但是，在像法国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参加政府的国度里，虚伪已经抬头。很多卑劣的政客变成社会主义者，目的在于获选担任公职；很多文化人成为社会主义者，目的在于推销他们的著作；很多剧作家成为社会主义者，目的在于取悦公众；很多教授成为社会主义者，目的在于获得大学的职务。但是，这种邪恶还传播得不十分广泛。在像意大利和德国这样的信仰社会主义需要有所牺牲的国度里，伪君子就靠边站了。将来一旦信仰社会主义能够换取荣誉、权力和财富时，他们会源源不断地蜂拥而来。

在我们所说的宗教情感的次要表现的领域里，伪君子大有人在。在某城市里——在此无需说出该城市的名称——有一个“旨在提高道德水准”的协会。它认为最大的罪过是合法婚姻之外的两性结合。该协会主席不辞而别，原因是个妓女宣称他是她儿子的父亲，她强迫他承认这个事实。在一个谴责淫秽读物的大会上，这位主席不得不告诫协会成员，某些淫秽印刷品是专门向他们展示以激起他们的愤慨的，而不是为某些人私下占有

而印制的。在巴黎，有些学生和年轻博士表面上装做禁酒，借此博那些狂热地主张绝对戒酒的教授的欢心。但私下里他们不反对饮甜酒，而且大量地饮用烈性酒。有位匿名作者似乎不为这种膨胀的宗教情感所动。他在一部希腊文选集中留下一句关于艾琳(Lrene)的警句。艾琳是个双关词，既是希腊和平女神，又是一个女子名字。这句警句是：“主教走进来说：给一切人以和平；但是，如果她只属于他，她怎么能属于一切人呢？”这些劣种发芽太快了，收获得太多了。不过，被薄伽丘嘲笑过的修士还会有当之无愧的后继者的。

各个时代的思想都要装在当时社会所使用的形式里。例如，若干世纪前，一切演讲都采用基督教形式。马基雅维利在剧本《曼陀罗花》中取笑这种传统，他让书中的修道士梯莫帖奥(Timoteo)旁征博引神学家的著作和基督教教义，来劝说玛东娜·卢克列齐娅(Moadonna Lucrezia)顺从情人的意愿。要是在今天的话，修道士梯莫帖奥则会乞灵于“团结”的口号和人道主义格言。

目前的危机与历史上的危机还有一个相似之

处，那就是派别丛生。原始基督教借助教皇制度来维持统一和正统观念。迄今为止，代表大会，即社会主义者的全体会议也能维持某种统一。在德国，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即使不能打垮异端，至少也能设法使异端平静下来。但是，将来还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这将如何收场，我们且拭目以待。

三、 旧精英的衰落

目前仍处于支配地位的精英，主要是由资产阶级组成的，另外还有少量其他精英的残余。

当一个精英衰落时，一般可以看到两个同时出现的迹象：

1. 衰落着的精英阶层变得比较温良恭俭，比较有人情味，同时也不太能捍卫自己的权力。

2. 另一方面，它对其他人的财富的贪婪和强取豪夺却丝毫不减，反而变本加厉地增加自己的非法侵占物，而且大量鲸吞国家财产。

这样，一方面它加重了压迫，而另一方面它维持这一压迫的实力减少了。这两种情况导致了毁灭这个精英阶层的大灾难。而只要这两者缺一，这个精英阶层就会兴盛起来。也就是说，如果它自己的实力没有削弱反而增强，那么它的占有物也会

增加；如果占有物减少，就可以用较少的力量来维持它的统治，当然，后一种情况不那么常见。例如，封建贵族在上升时期能够增加它的占有物，因为它的力量在增长。再如，罗马和英国的精英阶层在需要让步的时候就让步，因而也能保持自己的权力。相反，法国贵族在自己力量日益消亡时，却渴望保持自己的特权，或许还想增加特权，结果激起18世纪末的暴力革命。简言之，在某个社会阶级所拥有的权力和它所支配的捍卫这一权力的力量之间必须实现某种平衡。没有实力的统治不可能持久。

精英阶层常常会变得衰弱无力。他们维持着某种消极的勇气，而缺乏积极的勇气。人们惊讶地看到，在罗马帝国，精英阶层的成员只要能够取悦凯撒，竟然会自杀或毫无防备地让人暗杀。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法国贵族死在断头台上，而不拿起武器去战斗。

罗马帝国旧精英的精神之花曾令人惊愕地在西拉努（Silano）身上复活。他被囚禁在巴里（Bari）。当百人团长建议他自己割断脉管时

(suadentique venas abrumpere)，他回答说：他准备迎接死亡，但要战斗而死。虽然他赤手空拳，但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竭尽全力抗争，直到被刀迎面刺倒，就像在战场上阵亡那样。

如果路易十六有西拉努的精神，那么他不仅可以拯救自己和家族，而且可能使法国免除那么多的鲜血和痛苦。甚至在当时（1792年8月10日），他依然能够怀着胜利的希望投入战斗。泰纳（Taine）说：“如果这位国王想战斗的话，他依然能够保护自己，拯救自己，甚至取得胜利。”但是当时的精英与今天法国以及其他民主演进十分突出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很相似。虽然泰纳谈的是那个时代，但是他下面的话也恰恰描述出今日法国的情况：

18世纪末，对流血的恐惧弥漫了上层社会，乃至中产阶级；文雅的时尚和诗意的梦想削弱了战斗意志（今天法国的资产阶级又陷入甜蜜的梦幻中了）。无论在哪里，长官都忘记了维护社会和文明，肯定会比维护一小撮

罪犯和傻子的生命更重要。他们忘记了政府的基本目标与警察权力的目标一样，是用暴力维护秩序。

在古罗马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正是这种现象导致罗马帝国的崩溃。既然这种现象又在资产阶级身上重演了，那么其结局似乎很可能与在历史上看到的结局并无二致。

目前几乎在所有的文明国度里都能看到这种现象，但是情况最明显的是法国和比利时。在这两个国家里，激进社会主义的演进居于领先地位，因而也以某种方式表现出这种演进的一般前景。

稍微作些研究就会看到，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已被多愁善感的和人道主义的潮流压垮了。这些潮流与18世纪末的潮流十分相似。统治阶级的多愁善感几乎成为一种病态，很可能使刑法完全丧失效力。每天都有新法律被发现出来，帮助可怜的盗贼和文雅可亲的刺客。在没有新法律的地方，则对旧法律作随心所欲的解释。在法国蒂耶里堡(Chateau-Thierry)，一位目前远近驰名的法官干脆

无视法律而根据旁听众人的盲目热情进行审判。而资产阶级则听之任之，保持沉默。如果另一位法官想履行自己的职责，那么他会受到怀疑，或许还会被公开嘲笑。由于毫无束缚，流氓无赖已横行乡里。在孤立的村舍，他们威胁着行乞。他们放火烧毁富人府邸，或是出于报复，或是为了作恶，或者干脆是由于漫不经心。纵火现在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当局对此袖手旁观，无所作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其结果则是引起议会内的质问，或许还会导致内阁垮台。甚至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受害者的举止，他们缄默和顺从，似乎见了鬼而束手无策。最有勇气的人也仅仅希望某个将军重施拿破仑三世的手段，以此使他们摆脱瘟疫。

在罢工期间犯下的罪行始终不受惩罚，有时法官会通过有罪判决，但是这最多是做做样子，很快就会宣告无罪，有时是迫于工人的压力，有时则是由于政府为了“安抚”而自动做出的让步。工人已经继承了以往贵族的特权。他们实际上凌驾于法律之上，甚至有自己的特殊法庭。这种仲裁法庭

绝对指控“老板”和“资产阶级分子”，即便后者完全有理。在实行这种滑稽司法的地方，正直的律师会劝他的当事人不要提出诉讼，因为他肯定要败诉。当然，社会民主主义希望扩大这种特殊法庭的司法范围。教会的法庭被废除了，但是工人的法庭产生了。雅典民主政体通过诉讼逐渐毁灭了富人。（中世纪的）各个意大利共和国曾经仿效过它。今天，现代民主政治也在仿效它。掌权的旧精英搞得更糟糕，因此我们不能从这些事实中得出指责任何一种制度的结论。这些事实仅仅标志着哪个阶级在衰落，哪个阶级在兴起。当 A 阶级享有法律规定的特权，而且法律被不公正地解释成对 A 阶级有利和对 B 阶级不利时，显然 A 阶级拥有或几乎拥有凌驾于 B 阶级的优势。反过来也是一样。

陪审团的各种裁决也是这方面的标志。它们表明，资产阶级接受了普通人的最糟糕的情感，

最后，凡是有点浪漫色彩的地方，资产阶级的多愁善感显示了十足的愚蠢。这方面例子很多，只要举一个最近的例子便足以说明问题。一位带有

孩子气的感情用事的绅士为了“拯救”一个妓女而娶了她。但是由于无法共同生活，他希望与妻子离婚。于是她杀了他。陪审团却宣告她无罪。被告提出的一些理由是：

如果一个人在其生命的晚年没有完成他早先开始的善行，人们不会对他的死感到遗憾。我所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因为他遗弃我而杀死他。我之所以杀他还因为他曾经要求离婚，他使我蒙受耻辱，同时也玷污了他自己的名声。我将成为一个离了婚的女人？这办不到。所以只有一条出路了。

女权主义和戏剧台词的影响在小说和新闻界看得非常清楚：各方面都同情这位妓女。牺牲者也受到类似理论的传染，他曾经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一直把你看作《悲惨世界》中的芳汀。我相信你会再生的。”这位善良的男子如果对雨果、小仲马以及其他赞颂堕落女人的作家毫不注意的话，他会娶一个正派姑娘的。当然，他轻信这类华而不实

的言词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死刑可能有点过分了，而且，执行的方式（由谁和如何执行）也有悖于正义。在任何一个没有完全沉醉于“人道主义”教义的人看来，那些虔诚的、多愁善感的、女权主义的陪审团成员似乎都应该多少对这种说法有所怀疑，即谁若是“没有完成他早先开始的善行”，谁就应该被曾经受惠于这种善行的人杀死。

这位不得好报的人道主义者的命运，折射出革命时代法国人道主义贵族所遭遇的命运。它也反映了资产阶级将要面临的命运。资产阶级现在正致力于完成善行，使不幸者、堕落者乃至罪犯获得新生和荣耀。至少它在言论上这样表示。因此，它将因“没有完成善行”的错误而受到丧失财产的惩罚，如果不是上断头台的话。“只要阳光还照射着人类的不幸，羊就会被狼吃掉。”对于懂得这一点而且尚有能力的人来说，所能做的就是避免成为羊。

在1900年6月22日举行的共和派工商委员会的宴会上，米勒兰在说了几句开场白后，宣布他对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承认感到高兴：

我所做的努力就是沿着社会正义的道路推进几步，共和国应该永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的努力是从事社会恢复的工作，这意味着满怀同情地对待最不幸的人，尽力给他们比较多的正义和福利。

然后，他友好地向资产阶级致意，大谈一种联盟：

我们的内阁政府已经揭示了资产阶级与工人建立一种联盟的必要性。我们应该说，我们为这样一个联盟感到自豪。

在场的人没人想起那则古老的寓言：“与有权势的人结交绝无信义可言。”并且敢对这位公民“同志”和部长回答说：“在我们帮助你击败民族主义者后，你会像寓言中的狮子一样独吞一切。”

独吞战利品是绝对不公平的。

你们已经开了一个头了。你们号召我们

结成联盟，但是你们却允许人们不受惩罚的抢劫我们。此外，你们的朋友饶勒斯*——你们让他成为劳动部的成员——还建议，如果大多数工人想罢工，那么少数人就应该在警察的约束下表示服从，而资方不得让罢工工人继续工作或雇用其他没卷入罢工的人。

当时有很多工业家在场，但甚至没有一个人敢窃窃私语。这些人如此毫无斗志，理应得到不公正的对待。米勒兰在考虑他们时，会想起提贝里乌斯**在谈到另一批堕落的精英时所说的话：“噢，甘当奴隶的人们！”

所有的政党者在向人民献殷勤，唱颂歌。看到这种情况是很让人痛心的。在法国议会里甚至有一个类似加利费***的人也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

* 饶勒斯(Jaures, 1859—1914), 1914年以前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译者注

** 提贝里乌斯(公元前42—公元37)，古罗马第二代皇帝。——译者注

*** 加利费(Galliffet)，参加镇压巴黎公社的法国将军。——译者注

主义者！他们全都匍匐在新的君主脚下，在他面前贬低自己。

资产阶级日益变得软弱，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弥漫在该阶级之中的新的宗教热情。这种软弱也是造成目前的宗教危机的多种原因之一。人们常说，魔鬼在年迈力衰之时会立地成佛。名妓常常是在韶华消逝时停止邪恶的生活，变成偏执盲信的教徒。资产阶级的情况完全不同。虽然它已经变得偏执盲信，但它还没有停止邪恶的生活。

人道主义情感以及它们表现出来的多愁善感是虚空的、人为的、不真实的。众所周知，妓女、盗贼以及杀人犯都是值得同情的，但是，难道一位令人尊敬的母亲、一位高尚正直的男人不同样值得同情吗？研究今天穷人的苦难并试图减轻这些苦难，是善良高尚的行为。但是，那些今天过着舒适生活的人难道应该受到抢劫而陷于苦难，变成明天的穷人，变成另一堆垃圾吗？在现实中，今天的资产阶级并不考虑前途，他们耽于眼前——“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他们的多愁善感是语言的渲泄，

常常掩盖着肮脏的利润。这种软弱通常也是很卑鄙的。他们从事于高明的偷窃，而不必冒武装抢劫的危险。

处于衰落阶段的精英一般都表现出人道主义情感和无限仁慈，但是这种仁慈假使不仅是一种弱点的话，那么它也更多的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塞涅卡是个彻底的斯多噶派学者（禁欲主义者），但是他拥有巨大的财富，许多所华丽的宫殿以及无数奴隶。法国贵族颂扬卢梭，但也知道如何迫使佃户交租，他们对美德的新热情并没有妨碍他们耽于声色犬马的生活。他们的钱财是从食不果腹的农民那里榨取来的。在今天的法国，地主从他们的同胞那里征收成千上万里拉的谷物税和家畜税。他腰缠万贯，拿出一百里拉或者再稍多一点捐献给“人民大学”。他不仅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而且还希望以此获得选票。在花天酒地之余，对一贫如洗的穷人抛洒一滴同情之泪，恰能给感官一些愉快的刺激。今天的许多地主便是未来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他们脚踩两条船。未来过于遥远，谁知道它何时降临！既

享受自己的财产，又大谈平等、广交朋友、谋取官职，有时也寻找生财之道，而且只须支付言词和遥遥无期的许诺，这是多么令人惬意呀！用遥遥无期的期票来换取真正的财物总是有利可图的。

由于保护关税的实行使航海业、食糖以及其他许多有关产品享有额外奖励，还由于国家、辛迪加、托拉斯等等给企业以资助，统治阶级不正当地占有了庞大的财富，其数额肯定不下于其他时代的统治阶级的不义之财。对于民族来说，惟一的好处是剪羊皮的技术完善了。封建领主对旅行者的劫掠阻碍了商业的发展，他偷了几个铜板，但间接毁坏了几十元钱。而他的继承者受惠于保护关税，虽然不正当地获取了大量财富，但间接毁坏的财富要少些。

现在的统治阶级是贪得无厌的。随着权力的消退，它的欺诈活动日益增多。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美国，它每天都在要求进一步加强关税壁垒，要求制订新的保护贸易条款，要求用卫生条款来设置新的商业障碍，要求为各种产品提供新的补

贴。意大利的德普雷蒂斯*执政时期，地主拒绝支付自由农业人所要求的工资，政府曾派士兵去收割庄稼。今天这种绝妙的做法又重演了。封建徭役似乎卷土重来。士兵不仅仅被驱使保卫国家，而且为地主服务来维持低工资。而工资本来是应该由自由竞争加以确定的。

这就是我们最热烈的“人道主义者”掠夺穷人的办法。召开各种防治肺结核的大会当然很好，但是如果不抢走饥寒交迫者的面包就更好了。同样，如果少一点“人道主义”，或多一点对其他人财产的尊重就更好了。

但是毫无迹象可以表明，统治阶级打算抛弃错误的道路。可以设想，它将继续走下去，直到最后大祸临头。这一点在法国旧贵族的命运中已经可以看到。直到革命前夜，他们还在围攻路易十六，为金钱吵闹。在德普雷蒂斯时期的意大利，也可以看到有组织、有秩序的抢劫。无论选举人还是当选人，都在向对方出卖自己。1881年贸易保护制

* 德普雷蒂斯(Depretis, 1813--188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自1876年曾三次出任意大利首相。——译者注

度的强化，变成向最高出价者拍卖强征公民财产税的权利。其他人则在铁路、银行、铁厂和商船上大牟其利。统治阶级全都围在政府周围，大喊大叫，要求至少分得一杯羹。正是在那个时期播下了有害的种子。果实就是 1898 年 5 月的眼泪和鲜血。将来还有更苦的果实。统治阶级的非法攫取遭到人民暴力的反击。人民被不公正的镇压所压制，但没有被征服。我之所以说“不公正”，原因在于镇压的目的不是保护秩序和财产权，而是保护特权、保障掠夺以及采取像诺塔巴托罗（Notarbartolo）审判那样最可能引起公愤的行动。

这里需要提醒读者，当我们谈到统治阶级的精力衰退时，绝不是说暴力减少了。弱者恰恰是狂暴之徒，对此我们已屡见不鲜。胆小者是最残忍狂暴的。力量和暴力是个迥然不同的概念。图拉真*强大但不暴戾，尼禄**暴戾但不强大。

罪恶行径永远在增多，而精神、勇气和精力则

* 图拉真(Trajan, 约公元 52—117), 古罗马皇帝。——译者注

* * 尼禄(Nero, 约公元 37—68), 古罗马皇帝。——译者注

逐渐衰退。如果这二者之间的反差变得越来越大，那么结局只能是一种暴力灾难，只有这样才能恢复已经被搅得天翻地覆的平衡。

四、 新精英的兴起

今天人们有一种幻觉，似乎人民居统治阶级之首。实际上，占据这个位置的是未来新精英的一部分，这是一批依靠人民的精英。新精英与人民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差别已经露出蛛丝马迹。这预示着，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迹象将会变得类似于罗马平民中的贵族与其他平民的差别，或意大利各共和国中大行会与小行会之间的差别。那些行会之间的竞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英国旧工联与新工联的竞争相似。

无论在哪里，凡是在赚钱的行业谋生的工人都竭力将其他人从这些行业中排挤出去，其方法是严格限制准许学习某种特殊技能的人数。玻璃工人、印刷工人以及其他类似行业的工人组成了封闭的种姓。很多罢工起因于有组织的劳工排斥

无组织的工人。简言之，我们可以看到这堆混沌之物是如何分化和形成层次的。最上层恰恰形成了新的精英。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这批新精英的政治领袖几乎毫无例外地是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说，他们出自旧的贵族行列——后者的品质已经腐败，但智力并未衰退。这是资产阶级的错误所致。它迫使较优秀的部分站到对手方面，因而使这个统治阶级大为削弱。它丧失了最强有力、最有道德的正派人士，因而变得贫弱了。例如，在意大利有教养的人面临困难的选择：要么拥护自己阶级的不正当行为，如银行舞弊和诺塔巴托罗审判，要么加入社会主义者行列。他只能选择后者。

资产阶级出身的领袖与来自工人阶级的领袖在组成新精英时，各自所占的比例很可能会有些调整，后者的数量可能会增加，因为工人阶级现在愈来愈活跃，愈来愈有文化，也愈来愈强大。

目前的演化早在 19 世纪初已见端倪。在营养器官与躯体总结构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论对于生命体还是对于社会有机体来说，这都

是亘古不移的规律。谁也不会相信，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会有完全相似的构造。谁也不会相信，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有相同的社会秩序。比起上个世纪的社会，当今的社会当然已经大大工业化了，而且也不那么军事化了，因此它们的社会秩序也必然发生变化。凡是工业高度发展的地方，工人阶级迟早会获得重大的权力。对此，我们只要看看举行政治选举的国家情况就了然于心。只要一个城市实现工业化，几乎肯定会把社会主义者，至少是激进的议员送进议会。譬如，在意大利，过去米兰占优势的是“共济会”，都灵占优势的是君主派，但现在都选举社会主义者、共和派、激进派，原因就在于这些城市的工业过度发展。佛罗伦萨的工业增长要慢得多，因而该城市依然更信赖温和的政党。

这种总趋势已有人多次指出，因而无须在此赘述。但是另一种同样十分重要的趋势则是较近出现的，应该加以探讨。我指的是使工人阶级中一部分获取高薪的趋势，这一部分工人因此组成新精英的另一批核心。

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银行存款和资本的巨大增长。1870年后,欧洲没有发生会引起银行储蓄骤减的战争。即使说国家社会主义、统治阶级的贪污以及其他不法行为造成的浪费对储蓄增长有所遏制的话,所有这些原因加起来也没能阻止储蓄总额的增加。由于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前者变得不那么珍贵了,而后者的价值增加了。在技术许可的范围内,机器取代了人力。这种出于经济考虑的做法之所以在文明国家实行,恰恰是因为这些国家不缺少资本。而在其他国家,虽然具有一定的技术条件,但这种替代在经济上往往并不合算,因而人的体力劳动占较大的比重。因此,凡资本充裕的地方,人力就必然转到机器无法竞争的工作上,即要求判断力和理解力的工作上。另外,严格的优选制也有优越性。因为高工资的刺激能够保证由超出平均智力的工作人员来支配机器。一个挖土工人有两只手就足够了,如果他是一个两人高的大力神,那么他的工资应该加倍,但不可能再多了,因为另外两个人同样可以完成他的工作。然而,要驾驶火车头就需要判断力和理

解力强的人。如果在这些素质方面稍有缺欠,那么用两名司机顶替一名司机来开火车也无济于事,两名、三名,甚至四名平庸的司机都达不到一名精明能干的司机的运输量。在化工厂里,十名懵懂的化学师顶不上一名优秀的化学师。因此有一种十分强大的力量在不停地起作用,这种力量把劳工分成各种层次,赋予优秀者极大的优势。这正是形成新精英阶层的一个主要因素。

社会主义大人物们专注于如何分散资本,丝毫不注意上述情况。他们不懂得,这种做法使他们无意中与旧精英一起阻碍新精英的产生。新精英阶层只有在资本极为丰富的地方才能稳固地确立起来。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现象认识得非常清楚。他们凭直觉,甚至依据科学方法认识到,他们要想取得胜利必须有足够的资本为之铺路,正如他们说的:社会主义演进必须通过一个“资本主义阶段”。

另一种相当严格的选择是由工联和工团进行的,也有助于造就这个新精英阶层。这种选择被视为上述事实的一个结果,因为只有在资本充裕,因

而大工业能够繁荣发展的条件下，即必须始终有充足的储蓄和资本，这些工联和工团才能存在和兴旺。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这种充足本身似乎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这种现象的部分结果。恰恰是工业发展和工人新精英的形成促进了储蓄和资本的增长。

保罗·德·鲁西耶 (Paul de Rousiers) 充分注意到英国劳工演变的性质。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种演变，就会发现新精英形成过程中的那些特征。他在谈到工联领袖时说：

他们身上首先令人惊愕的是非常明晰精细、讲求实际的头脑、现实的态度、健全的常识，这就保证了他们活动的成功。

这些恰恰是在行将灭亡的旧精英身上正在消失的品质。

那些确信必须彻底推翻社会的人，那些被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学说所吸引的人，一方

面怀有梦寐以求的理想，另一方面则集中全力于实际领域，以获得具体的成功……而且他们之中许多人一心追求无须修改社会制度便能得到的利益：

他们争辩起来态度强硬，绝不沉湎于资产阶级那种脆弱的人道主义情感之中。他们声称：

弱者若不与自己的软弱作斗争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需要的是坚强的良心、对自己的道德责任的强烈意识。讲求实际的头脑、高尚的道德准则和教育这三种主要品质保证了工联领袖的成功。

这些不恰恰是精英（即“优秀者”）有别于其他人的品质吗？

跟在将军后面的是校官、尉官、军士和士兵，他们都是精选出来的。严格地说，这里并不存在一个精英阶层，而是有各种层次，它们共同组成了精英。

我们应该放下架子，到这些普通的办事人员和普通工人中间看看。这样才能发现工联获得成功的深刻原因。首先，在交纳会费方面有一定规约，从而保证了财政来源。这是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在英国，有组织的工人在缔结了一项严肃的协定后，就严格地执行它。如果一名会员欠交会费几个星期，他就会被除名，除非他因失业、意外事故、生病等原因而得到的谅解。

如果他离开了工联，会怎么样呢？他会沦入新的无产阶级。这种新无产阶级是与新精英一起形成的。现在的资产阶级子弟在听任这个新精英剥夺自己之后，也会沉沦到这个行列里。鲁西耶补充说：

我强调定期缴纳会费这一物质层面，因为它不仅确保了工联的财政权力，而且它是成员身份的标志。我们还会有机会谈论到这

一点——工会会员是精选的产物：“最优秀的人属于工联”。这些人为了一个自己所理解的目标而自愿地联合起来，他们……是成功的真正基础。

这不正是对于一群精英诞生的精彩描述吗？

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反复声称，在他们的学说传播之处，工人变得更有道德、更正派、也较少使用暴力。他们不再毒打妻子，否则他们就会被排斥在外。而这些被排斥的人就在小酒馆里酗酒。情况的确如此，但有一点要纠正，即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变得如何，而是按照这种标准精选出来的。因此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们不否认一个人的习惯可以改变，但是迄今人所共知，这种情况是例外，规律告诉我们，如果说物种能够极其缓慢地变异，那么个体的变化确实是微乎其微的。我们需要一名优秀的数学家，我们就把他挑选出来。人们绝不可能通过良好的教育把一个低能儿造就成一个数学家。有谁能够使懦夫变得勇敢，使荡妇变得贞洁，使鼠目寸光者变得目光远大？

另外，我们并不想否认社会主义者使品德良好的工人数量增加了。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给那些品德良好的人提供了表现自己的条件。即便我们假定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某些人，但是最终还会剩下一些品质低劣的人。这些人不诚实、没有道德、智力低下，他们将组成新的无产阶级。

我的一位朋友在法国当报纸编辑。她强烈地反对工会。她告诉我，她曾不得不为自己的杂志与印刷工会谈判：“因为临时工完全没有受过训练，无法信任他们。”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流动的临时工（sarraceni）无论自愿与否都被排斥在工团之外，而且找不到工作。他们被排斥在自己阶级的精英之外，而沦为无产阶级。

这类选择很快会成为主要方式，因为它的起因——资本增多和产业变化——正日益加强。

德国俾斯麦政府和意大利资产阶级旧政府的政治迫害，也有利于这个新精英的筛选。由于这些迫害，许多不坚定分子被清除了，职业政客也退避三舍。与此相反，在法国，社会主义在政府中也占

一席之地，因此在社会主义者队伍中有大量的职业政客。这种与胜利共生的祸害迟早也会纠缠住其他国家的新精英。对于这个新精英来说，这种情况最好是晚一点而不是早一点发生，即最好是在它已经牢固地确立之后，而不是在它还很软弱的形成过程中发生。

这个新精英的出现也表现在，我们前面提到的与宗教危机有关的事实中。法国的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加入政府，另一部分则依然在政府外边鼓噪。他们组成新的无产阶级。他们大喊大叫，通过反对米勒兰及其支持者的动议，而米勒兰一伙则对这些指责加以嘲笑。如果瑞曼最大胆的提议变成现实的话，那么一个新精英就会突然出现；它会集合在自己的君士坦丁大帝周围，使用刺刀和步枪来对付把陈旧的人道主义演讲当真看待的新无产阶级。

在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大会上，他们用暴力驱逐了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持不同政见者或异端。在伦敦，他们甚至借助资产阶级的警察来这样做。他们做得很漂亮，而且他们别无选择，因为不

使用暴力，任何秩序都不能持久。只有那些不幸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才会梦想一个只有牛奶和蜜的政府，才会要求士兵站立不动，直到他们之中有人倒毙后才能动用武器。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未来精英的政策绝不会如此有耐心。因为将会成为主宰的人所具有的观念将是生气勃勃的年轻人的观念，而不是天真老人的观念。

我们现在来看看民主和社会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如法国。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新旧精英之间的战斗结局是无可置疑的。新精英充满活力和朝气，旧精英则疲惫不堪。新精英气吞山河，宣布“阶级斗争”；旧精英则幼稚地赞美“团结”。后者遭到打击时不是以牙还牙，反而感恩戴德。

看看新闻界吧。新兴的精英有报刊来捍卫自己正当的和全体的利益。那些饥寒交迫的人节衣缩食来支持他们。资产阶级不想（也不知道如何）做出必要的金融牺牲以拥有一份这样的报纸。例如，几乎没有一家资产阶级报纸可以与《前进报》*

* 《前进报》，意大利社会主义报纸，曾由墨索里尼主持。

——译者注

相匹敌。当然，资产阶级资助了许多报纸，甚至可以说资助了太多的报纸。但是，作为这些报纸的后盾的是既不正当又非全体的利益。贴补它们是为了从巴拿马运河、铁路合同、钢铁合同、商船津贴、保护关税中牟取利益。支持它们的是掠夺公共财产的奸诈的承包商，或者是某些想成为参议员、众议员或市政议员的野心勃勃的绅士。简言之，这些报纸服务于特殊的、不那么正当的利益。

再看看罢工。工人信任自己的同志；他们忍受痛苦和饥饿，除非所有的同志都被工厂重新接纳，否则就不复工。只有当一切抵抗都无效时，他们才承认失败。与此相反，雇主一般都不信任雇来顶替罢工工人的人，雇主毫无顾忌厚颜无耻地牺牲他们。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这里只须举出去年伦敦粉刷公司的例子。该公司与罢工雇员达成一项妥协，而将顶替的意大利工人抛在一边。

再看看某些国家的议员。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议员十分正派而受到尊敬。而那些政客议员则与内阁部长们纠缠不休，谋取恩惠。如果他们能从中谋利的话，他们每天都会为三十个银币而出卖

基督。

再看看新精英吐故纳新的纪律。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成员中有一名罪犯，他们立即就将他赶走。与此相反，资产阶级认为看到自己阶级最卑劣的犯罪活动就闭上双眼是最聪明的做法。在意大利，盗窃银行的人、保护诺塔巴托罗（Notarbartolo）的凶手的人不受任何惩罚，相反，他们身居高位，所有的人都向他们表示敬意。

鲁西耶讲述了一个泥水匠工会的故事：

严格的规章是针对拖欠会费者的。我曾目睹一个例子。一大我陪工会干事 D 先生寻访工厂。我们刚刚来到由偷工减料的工人草率建造的一排房屋，就碰见一个工人，他似乎因我同伴的到来而不知所措。这个泥水匠正在隔墙上涂抹灰泥。D 先生说：“你是否已经准备好兑现上个星期六你对我说的话？”这个可怜虫垂头丧气地回答：“没有。”D 先生接着说：“我已经警告过你了，因此如果今天的事使你不愉快，那么责任完全在你自己，是你自

己的错。你懂吗？”“我懂。”D先生毫不考虑他的难处，转而对我说：“……你在这里看到一个可怜虫，这些人没有能力照管自己……”幸好，这时老板来了……他从衣兜里掏出五先令给这个泥水匠，算是预付工资。泥水匠转而将钱交给D先生，付清欠款。这样他能继续工作了。D先生对我讲：“否则，我会毫不犹豫地停止他的工作。”

这位干事是工会雇用来监督工会规则执行情况的官员。如果他是蒂耶里堡的法官，受资产阶级政府雇用来执行法律，他就不会如此坚决，而会说几句这个可怜虫如何不幸的漂亮话。如果工会会员像资产阶级那样，不支持自己的干事的话，那么一部分会员就会掀起道德大论战，鼓吹与那些不缴会费的人保持“团结”，用愚蠢的空话使规章失效；还有些人做得更糟：他们会要求干事不去关心工会正当的和全体的利益，而去关心某个会员不那么正当和特殊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干事对欠交会费的会员讲的就不是前面那番话，而是：

下次选举时你投达米安尼(Damiani)的票吧,他是克里斯皮(Crispi)* (这是一位意大利将军自我吹嘘的话)。他当选了,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否则还得交钱。

如果有人对你讲:

现在有 A、B 两军对阵。A 军没有纪律、没有斗志、没有忠诚的信念。这些人甚至不敢清晰地说他们在和 B 军作战,他们想装成休战状态。他们发起募捐,向 B 军提供武器装备,但不想为自己的军队花一分钱。他们喋喋不休,言不及义,缘木求鱼,劳而无功。优秀的士兵临阵投向 B 军。相反,B 军战士知道自己的要求,而且强烈要求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纪律严明,忠于自己的信念。他们高举自己的旗帜,清晰宣布他们要战胜、击溃和消灭 A 军。他

* 克里斯皮(Crispi, 1819—1901),意大利政治家,两度出任首相,政治上采取高压手段。——译者注

们紧密结合在一起，每个人都准备为自己的同志和事业而献身。他们从不想援助敌人。他们设法为自己而不是为其他人搞到武器装备。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

如果问你：“你认为哪一方会取胜？”难道你会迟疑不决吗？

资产阶级正是这样地花费精力和钱财来援助敌人。帮助邪恶者、无能者和堕落者的组织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但是在这些组织中，资产阶级不敢建立一个捍卫自己权利的组织。那么，他们还有权利吗？表面上他们没有，因为他们羞于谈论自己的权利。私有者否认自己的所有权并向“人民大学”捐款，而这种学校向学生讲授应该剥夺私有者的一切。从某种观点看，可以说，他们实际上没有权力，因为他们不知如何保卫这些权力。

目前，这个新精英还有很大的灵活性，还对一切人开放。但是胜利以后，它会和其他精英一样，变得愈益僵化，愈益排他。应该指出，佛教宣传人人平等，但却产生出西藏的僧侣政治；基督教似乎是专

为穷人和贱民创立的，但却产生出罗马僧侣政治。宗教改革时期的新精英对此发起挑战，但是因为罗马教会尚未彻底腐烂，所以它只遭到局部失败。宗教改革时期，旧精英的衰落和陡增的狂妄可以从强盗贵族的出现清楚地看出：济金根*和胡登**是这种革命骑士的两种类型。这个新精英集团像以往一样依靠着穷人和贱民，后者像以往一样相信对他们的承诺，结果他们像以往一样被欺骗了，甚至比以往更重的枷锁套住了他们。与此类似的是，1789年革命产生了雅各宾（Jacobin）寡头统治，最后以帝国专制而告终。以前都是如此，因而没有理由相信这种事件演变过程现在会改变。在很多世纪以前《谶语集》（*Carmi Sibillini*）就向人类许诺：“不再有富人和穷人，不再有暴君和奴隶；任何人不再崇高也不再渺小，不再有国王和首领，一切都将成为公有。”不幸的人们至今仍在期待这些预言变成现实。与此十分相似的是，新的重大预言将会

* 济金根（Sickingen, 1481—1523），德国骑士，支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译者注

** 胡登（Hutten, 1488—1523），德国骑士和诗人，在反对德国诸侯的战争中，参加济金根的军队。——译者注

有同样的结果，而且在同样短的时间里就可以看到这种结果。在胜利之后，这个新贵族或许在形式上和口头上对新无产阶级，即那些弱者、目光短浅者和无能者，作出某些让步，但是后者可能将被套上比现在还要沉重的枷锁。这些新主人不会像资产阶级现在这样衰老无力，至少暂时不会。

勒邦*说：“今天的工人发现自己处于千载难逢的阶段。他颐指气使，可以宰杀下金蛋的母鸡而不受惩罚。”这话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譬如，在俄国和意大利就不适用。但是，在较先进的、走上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确实如此。令人奇怪的是，在某些实行累进所得税的地方，这种税制竟能不断地提高到使统治阶级获得最大好处的限度。罗马奴隶主从经验中懂得，应该让奴隶有点“留窝鸡蛋”，这将刺激他继续劳动，为主人生产更多的东西。同样，某些民主政府从经验中懂得，将承包商和资本家洗劫一空，恰如杀掉下金蛋的母鸡。因此，他们让后者保持某些利润，既剥夺他们，又要使他们仍然有兴趣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财富，

* 勒邦(Le Bon, 1841—1931),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译者注

在经济活动中谋取利益。故而民主政府尽其所能用最佳方式来剥削他们，一如奴隶主剥削奴隶。现在尚不能断定，新的精英将来是否会像现在的精英那样，以极大的耐心容忍自己被抢劫，因此如果仅就这些例子而言，勒邦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

这位作者还注意到常备军，其观点也仅在很小的程度上是正确的。他认为，由一切公民组成的常备军最后会成为社会主义战争中的一个武器：“各国政府尚未发觉其中包含的危险，因此强调这种危险是徒劳的。”“事件的演变已经毁坏了多少世代建成的大厦的根基。这座大厦最后和惟一的支柱——军队——正在日益分崩离析。”这种说法或许适用于法国，但不适用于德国。没有任何迹象能说明德国军队将要分崩离析。相反，众所周知，由于这支军队的军官完全出身于上层阶级，它似乎令人难以捉摸。社会主义在德国取得胜利的惟一道路，似乎很可能是璩曼所说的道路。

无论如何，关于形式方面，我们不应忘记，我们的科学知识是不充分的，因而我们几乎无法预见，而且我们对于这种现象的实质几乎毫无认识。

五、 主观现象

如果我们的认识过程没有将宗教危机过分曲解的话，那么这种主观现象也就没有太远离现实。然而也许在宗教情感的次要表现上有些偏差。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社会主义者，都多少感觉到自己在被这种宗教浪潮带着往前走。的确，社会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强调自己宗教的科学方面，但是某些新教教派又何尝不是如此。人们惊奇地看到，长时间以来，他们之中的某些教派将自己的信仰与纯粹理性主义结合起来。对于他们，耶稣基督不再是一个神圣存在，而更像是人中俊杰。神迹也被用自然法则加以解释。这种趋势自宗教信仰减弱的时代以来就在发展之中。1860年前后也属于这一时代。这是一个新的上升时期，这时这些教派并不是沿着旧路卷土重来，而是沿着另一条路

复兴宗教。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有了一种社会宗教，尽管他们不想听到这种说法。在他们那里，基督著作中的超自然成分完全消失，留下的只是旨在提高穷人的、具有社会性质的内容。

这些派别的教义不能满足任何人类要求，因此他们很可能像小溪一样消失在社会主义大潮中，那些期待奇迹出现的芸芸众生加入坚持基督具有神性的人的行列，那些不信基督有神性的人则毫不犹豫地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些派别已经是一支没有士兵的军官大军。人民既不理解、也不喜欢他们。

对于许多资产阶级来说，基督教浪潮似乎是一个他们可以依赖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工具，也就是说，在宗教情感的众多表现形式中，他们选择了一个与他们的利益冲突最小的表现形式。至少他们是这样看的。这种选择的理由当然会收到某种效果，但远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有时这种理由是事先提出的，有时则是事后找的。无论何种情况，如果说在这理由后面有一个战略思想的话，那么它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统治阶级希望利用旧的宗

教信仰来使人民驯服。正因为如此,人民现在愈益脱离这些信仰,转向新的信仰,尤其是社会主义信仰。资产阶级只是在自己的成员中获得成功。这里打个比喻,假如有位将军想对敌方士兵施行催眠术,以便更轻易地击败他们。但是,他费尽心机,不仅没有催眠任何一个敌人,反而使自己的士兵受到催眠,结果自己的军队更容易被人打败。迄今我们看到的资产阶级的成果就是这种情况。不仅在旧的宗教形式方面,而且在新的宗教形式方面,他们都是授柄于人。

巴黎政治经济学协会断言,在法国,禁酒鼓吹者的活动只对有关阶级有些影响,对大众则几乎毫无作用。酗酒者一如既往,只有适度饮酒者保持明智的态度而稍微减量。上流阶级的这种禁欲态度只会使他们变得更无生气、更落魄、更无力保卫自己。对于那些不吃肉、不喝酒、见了美貌女人便垂下眼皮的人,你能有什么指望呢?他们可以到埃及古城底比斯(Thebaid)去出家修行,但是他们不可能去战斗,不可能在人生战场上取胜。

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认为,社会主义者的著作

所采取的方式是：以直接行动确保“世界和平”、“社会美德”、“社会正义”及其他类似的“社会”事物。社会主义成长起来和变得强大几乎完全出于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他们一心实现某种最终必然毁灭他们的东西，这使人不禁想起但丁对菲利波·阿根蒂(Filippo Argenti)的描述：

佛罗伦萨人的奇异精神，
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如果资产阶级完全明白他们的努力必然导致什么结局，那么他们倒会成为英雄和烈士。但是，因为他们在糊里糊涂地毁灭自己，所以他们只不过是傻瓜。

至于在宗教情感的次要表现方面，人们一般相信他们完全是按科学推理行事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现象是被主观歪曲的。

要想理解这些人的心态，我们必须考虑经济危机时发生的情况。在繁荣时期，一切旨在证明一个企业会赚钱的论点都会受到青睐。而同样的论

点在衰退时期则会绝对受到排斥。金融家对此十分内行，他们的说法是市场景气或不景气。人们在衰退时期拒绝购买股票时，认为自己完全是在理性指导下行事，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听命于日常获得的经济新闻所造成的无数细小印象。以后，当他在繁荣时期购买同样的股票时，虽然这些股票并不提供更多的成功机会，但是依然认为，自己完全是受理性驱使。他依然不知道，他的态度转变取决于周围气氛引起的情感变化。

众所周知，在交易所，大部分人只是在市场景气时买进，在不景气时卖出。虽然金融家有时也受感情波动的支配，不按照理性行事，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业务比较大，运用理智更多一些。这正是他们获利的主要原因。在繁荣时期，任何能说明这种繁荣会持续下去的平庸论点都有很大的说服力。如果你试着告诉人们，价格不会无限制上涨，人们肯定不想听。相反，在衰退时期，有说服力的论点是那些劝人相信一切都糟得很，股票价格肯定会下跌的论点。任何旨在振奋精神的主意都会落空。

类似的事实在道德和宗教危机时期也可以看

到。视酒如仇的人会诚恳地相信，他受到科学理性的指导。他不知道，如果他在一个怀疑论流行的时代，听到今天似乎很有说服力的论点，那么这些论点就一文不值，只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

这些事实有很多原因。当然人们受到很多局限，但其他主观和客观原因也起作用。本文不打算研究这个问题，只是要把这些事实揭示出来，而不论它们的原因是什么。

现存精英的衰落和新精英的兴起，在人们的意识和理智中好像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在这种情况下里，主观现象和客观现象有重大背离。

我们已经指出某些背离。许多“人道主义者”非常真诚地认为，他们在致力于强化利他主义情感。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在帮助新精英的利己主义取得胜利。当 A 的利己主义与 B 的利己主义之间存在着竞争时，利他主义者应该问自己，为什么要对某一方更偏袒呢？但是现在却这样推论：“如果 A 是利他主义者，A 就应该给 B 一点东西。”此言不谬。但是，这个命题完全可以颠倒过来，可以说，如果 B 也是利他主义者，它

就不应该接受 A 的牺牲。许多卫生学家完全相信自己的理论，认为他们追求的仅仅是人类的福利。许多“品德高尚”人士相信，他们的活动是为了某些抽象的道德观念。他们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们正背叛自己的阶级，帮助一个新精英集团取得胜利，而这个精英集团在胜利之后并不会比现在的精英更高尚。

主观现象与客观现象之间的对反可以从法国德雷福斯案件中清楚地看到。如果某人要讲述这个主观现象，即用通常的方式表达思想，那么他会报道说：这是一个无辜者的非法审判，由于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偏见对某些人的侵犯，一场争取公正的战斗打响了。但是，因为他认为这些词句名副其实，客观现象几乎与上述词句毫无二致，所以他也同样会认为，拜占庭帝国时期血腥战斗的惟一原因是微妙的神学争端，而不认为这种争端是政治角逐的一个幕帟。

的确，真相全然与此不同。德雷福斯案件只是现在的精英与未来的精英争斗的一个插曲。现在的精英的一小部分曾经——尤其是在 1850 年至

1870 年之间——试着仰赖自由、理性和睿智。这些人现在已看到自己的错误，认识到人是受情感而不是受理性支配的，惟一可行的选择是选择情感或选择宗教。因此，这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再次靠近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后者无论意识到与否，一直持有类似的想法。

人们能用什么来对抗来势汹汹的社会主义宗教呢？法国的上流阶级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它努力振奋旧的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它试图利用某些反社会主义的情绪，因而引发了反犹主义。最后，它也有了一种以“民族主义”为幌子的新宗教。这种新宗教在诱惑军队时极其有力。应该指出，我并没有暗示说，这类计划是有预谋的，是故意实行的。事实表明，大多数人都是在所处环境的压力下不自觉地实行这一计划。也许有个老奸巨猾的领袖看清了这一运动的方向，但他小心谨慎地避免提到这一点，以防止削弱他的同伙的盲目信念。

当德雷福斯案件出现时，民族主义者敏锐地觉察到很可利用一番。这是一个赢得军队的支持进而使用武力的绝妙机会。拿破仑一世在圣赫勒

拿岛上会让人给他读拉辛的剧本《布里塔尼居斯》。他精辟地指出：“最能影响君主决策的莫过于刺伤他们的虚荣心。历来如此。”民族主义者将对高级军官的冒犯视为对自己的侮辱，因而诉诸于一个聪明的策略。他们的计划并非不合理，若不是由于费利克斯·福雷（Félix Faure）总统突然去世，这个计划也许就完全成功了。

因此，客观现象不过是上述两个精英集团之间的斗争。德雷福斯案件已经过去，或差不多过去了。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息。今天，就在我撰写本文时，由于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所作所为，社会主义者正在取得胜利。但是不能预言明天会发生什么。这一战斗的起伏曲折是无法预见的。瓦尔德克—卢梭内阁对于自己阶级所起的作用，与当年拉法耶特*对他的阶级所起的作用一样，这样一种无意之中形成的联盟对于新精英集团是极其宝贵的。他们的愿望就是战胜旧的精英。

1900年6月15日法国议会对索恩河畔沙隆

* 拉法耶特（Lafayette, 1759-1834），法国自由派贵族、法国大革命政治家，《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起草人之一。——译者注

(Châlou-sur-Saône) 罢工的有关事实进行调查。内阁曾不太及时地采取措施镇压某些暴力行动。议会接受了当天一项部分针对警察武装机构的程序，该程序宣布：“议会相信政府履行的一切职责将会被司法审讯加以确认，因而通过这项程序。”

这项程序获得支持，并根据议员马萨鲍 (Massabuau) 的建议附加一句话：“议会……指责蒙骗了劳工的集体主义学说，因而通过这项程序。”接下来发生的是，某些保守议员投票反对内阁，因而似乎在反对维持秩序，而某些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议员支持内阁，因而似乎在反对集体主义。实际上，双方都是对的，因为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作为将最有效地保证社会主义者即将取得的胜利。我们应该注意大工业巨头阿·雷耶 (A. Reille)、德索拉日 (de Solage) 和施耐德 (Schneider) 投了弃权票，这证实了我们关于现在的精英缺乏勇气的说法。他们将成为社会主义的第一批牺牲品，而且他们实际上已经受到很大损失。但是，他们不敢声张出去，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失去政府的恩惠。这些恩惠补偿了迄今他们在

社会主义者手中遭受的损失。如果意大利有一个最不倾向社会主义的政府，那么支持它的人将会是那些从海运津贴保护关税等获利的人、那些今天以社会主义的敌人自居的人。这些高雅的斗士像向日葵，总是转向有可能获利的一面。

主观现象与客观现象的背离造成许许多多的错觉。例如，许多人认为，他们只要与社会主义学说作战就能有效地战胜社会主义，这正像过去有人认为，只要挑出《圣经》里不符合科学的谬误之处，就能有效地战胜基督教。今天几乎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会承认这些错误。但是，这对基督教有何损害？没有。基督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兴旺。人们曾试着对马克思的价值学说作出各种微言大义的解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学识最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竟然说，马克思从未试图建立一种价值学说。但所有这一切几乎对社会主义信念毫无伤害。不是马克思的书造就出社会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使马克思的书闻名遐迩。不是伏尔泰的著作在 18 世纪末产生出怀疑论，而是怀疑论使伏尔泰的著作享有声誉。当然这样说仅仅是为了阐

明这种现象的主导方面，因为应该补充说，形式也有价值。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是用一种经过挑选的方式来表达当时法国上流社会的情感，他们赋予这些情感以新的活力。对于马克思也应该作类似的评价。

当前，上流社会的软弱确实是人道主义潮流的主要根源，或许也是宗教潮流的主要根源。但人道主义情感反过来也起作用。它成为更加软弱和斗志消沉的根源。相反，革命社会主义者的行动方式最适宜用来向这些心力交瘁的躯体注入活力。对于法国资产阶级来说，一个盖得（Jules Guesde）政府所具有的危险性比一个瓦尔德克—卢梭政府要少得多。在德国，基督教社会主义是大众社会主义的一个极好的实习期。一般说来，人道主义者、感伤主义者和道德鼓吹者是现在的精英最可怕的敌人，是未来的精英最好的朋友。

在未来的社会变动中总会有某个因素是不为人所知的，因此有些变化可能会导致文明国家之间的长期战争。这些变化很可能导致将一个军事独裁政权强加给某些欧洲国家。但是，这样一种

独裁与这些新精英的关系会怎么样，我们还没有注意到。那些判断力完全受主观现象变化影响的人会相信，军事独裁可能仅仅有利于现在的精英，但是更关注客观现象的人不会毫无疑问地接受这样一个假定。

今天，要想言之有据地讨论这一切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精英集团衰落和另一个精英集团兴起的宏观现象，这种现象的客观形式还几乎难以看清。我们无须徒劳地试图揭开掩盖着未来的纱幕。

译名对照表

A

A. Reille 阿·雷耶

Aesculapius 埃斯库拉庇
俄斯

Alexander 亚历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
山大大帝

Anatolia 安纳托利亚

Augustus 奥古斯都

authority 权威

B

Bebel 倍倍尔

Bernard, Claude 贝尔纳

Bernstein 伯恩斯坦

Bismarck 俾斯麦

Bolivia 玻利维亚

Bonaparte 波拿巴

Bruneteire 布伦涅梯耶尔

C

Caesar 凯撒

Ceres 色列斯

Champollion 商博良

Château-Thierry 蒂耶里
堡

Cicero 西塞罗

Clement 克莱门特

Copernicus 哥白尼

Crispi 克里斯皮

Floronce 佛罗伦萨

D

D'Orbigny 多尔比尼

Damiani 达米安尼

Dante 但丁

De Amicis 阿米契斯

de Solage 德索拉日

Delphi 特尔斐

Depretis 德普雷蒂斯

Diocletian 戴克里先

Dreyfus 德雷福斯

E

elite 精英

F

Fabians 费边社

Félix Faure 费利克斯·

福雷

Filippo Argenti 菲利波·

阿根廷

G

Gabriel 加布里埃尔

Galilee 加利利

Galileo Ferraris 伽利略·
费拉里

Galliffet 加利费

H

H. Faye 费耶

Hecate 海克提

Herodotus 希罗多德

humanitarian 人道主义
者

Hutten 胡登

J

Jacobin 雅各宾

Jansenist 詹森派

Jauves 饶勒斯

Jevons 杰文斯

jingoism 极端爱国主义

Juglar 朱格拉

Jules Guesde 盖德

L

Lafayette 拉法耶特

Laplace 拉普拉斯

Lattanzio 拉坦齐奥

Le Bon 勒邦

Liebknecht 李卜克内西

Louis XVI 路易十六

Lucian 琉善

M

Machiavelli 马基雅维利

Malthus 马尔萨斯

Mansion 曼申

Marx 马克思

Maury 毛利

Milan 米兰

millenarianism 千禧年说

Millerand 米勒兰

Mithra 密特拉

Moadonna Lucrezia 玛东

娜·卢克列齐娅

Montanists 孟他努派

Montesquieu 孟德斯鸠

N

Napoleon Bonaparte 拿

破仑·波拿巴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Naumann 瑙曼

Nero 尼禄

Notarbartolo 诺塔巴托罗

O

occultism 神秘论

P

Pachacmac 帕查卡马克

Pantaleoni 潘塔列奥尼
Paul de Rousiers 保罗·
德·鲁西耶
Pericles 伯里克利
Ptolemaic system 托勒密
体系
Ptolemies 托勒密

R

Racine 拉辛
Renan 勒南

S

Salamis 撒拉米
Santa Lucia 圣徒卢西亚
sarraceni 临时丁
Schneider 施耐德
Seneca 塞涅卡
Sickingen 济金根
Silano 西拉努
Spencer 斯宾塞

spiritualism 唯灵论
St. Paul 圣保罗
Stoics 斯多噶派
symbolism 象征论
syndicate 辛迪加

T

Tacitus 塔西陀
Taine 泰纳
the Dominicans 多明我会
The Encyclopedists 百科
全书派
the Franciscans 方济各
会
Thebaid 底比斯
Themistocles 铁米斯托克
里
Tiberius Gracchus 提比
里乌斯·格拉古
Timoteo 梯莫帖奥
Tocqueville 托克维尔

Trajan 图拉真

V

Venus 维纳斯

Voltaire 伏尔泰

W

Waldeck-Rousseau 瓦尔
德克—卢梭

X

Xenophon 色诺芬

Z

Zeus 宙斯